

印象

# 早安

## 北京·食

“民以食为天”。一份可口、热乎的早餐意味着美好一天的开始。为了让市民吃好早餐，北京市早在2002年就启动了早餐工程，14年间北京早餐这个巨大的刚需市场在政府引导和市场竞争下迅速发展，如今已逐步形成以固定的早餐门店、搭载早餐服务的连锁便利店和主食加工配送中心为主要形式的“多渠

道、多层次”早餐供应模式。“食以安为先”。为了让百姓吃到放心可口、价廉物美的早餐，许多人天还未亮便开始忙碌。那些可敬的劳动者用勤劳的汗水和真诚的笑脸，温暖着每天早起奔波的人们，让北京的清晨生机勃勃。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图① 北京开阳楼饭店面点师孙俊伟(右),每天凌晨4点便开始工作,为百姓的早点餐忙碌着。  
图② 北京报国寺小吃店,市民李新(右)带着从国外归来的儿子品尝北京传统早餐。  
图③ 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餐厅早班服务员崔银芳耐心为顾客服务。



### 身边科技工作者

徐东成:

## 燃尽毕生年华 浇灌科技之花

本报记者 袁勇

2015年10月13日,浙江省金华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徐东成罹患癌症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51岁。金华市许多企业负责人为之落泪。在他们看来,这位为金华科技企业甘当“店小二”的局长,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铁局长”。

徐东成出生在金华市龙游县的一个农村家庭,襁褓中丧母的他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尽管生活艰苦,但他从未停止对知识的追求。1990年,他是中学老师的他考入北京大学,先后获得有机化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0年,他又先后赴韩国、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学者生涯中,他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共有11篇论文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其中6篇为SCI收录。

出色的科研能力为他引来了众多工作机会,一些国外大公司希望以高薪聘请他。但他却毅然放弃了这些机会,选择回国发展。在徐东成的妻子何平看来,这是因为他心中充满家国情怀,“他一直觉得在国外没有家的感觉”。

有家国情怀,也是金华市众多干部群众对徐东成的一致评价。2003年2月份,怀着满腔热血,徐东成作为引进人才回到了家乡,担任金华省级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成为金华市学历最高的领导干部,后来又先后担任金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东阳市副市长、金东区委副书记等职。

在科技强省浙江,金华的科技水平不算高。“作为一个科技人,我的内心是非常沉重的,别说睡安稳觉,简直是坐立不安,恨不得把新信息、新想法一股脑儿装进企业主的头脑里,把摸到的好成果、好项目马上引进到金华,实现产业化。”徐东成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迫切的心情转变成了工作动力。一上任,徐东成就开始奔波于企业之间,了解到企业有什么技术难题,他就马上联系认识的对口专家;看到企业研发出新产品,他主动帮忙联系市场销路;发现本地上下游企业的产品可配套,就积极推动构建产业链……如今,科技园已成为金华知名的“创业谷”,至2016年11月份,园区累计引进企业61家,入孵项目19个,已成为金华市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力量。

2015年,遭遇病魔的徐东成在治疗拖了又拖之后,再也难以坚持工作,到北京治疗。躺在病床上的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金华市的科技事业,金华市科技局工业与高新技术处处长陈英清清楚地记得徐东成打给他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他的声音已很虚弱,对我说,我的几个北大学生来看我,聊到一个新能源项目,很不错,你们要做好跟踪……”

## 蔡奶奶的两元理发店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1月6日上午,记者来到蔡瑞云的理发店时,已经有好几位老人在等着理发。

这家理发店的陈设简单质朴,在一排老旧的理发工具前,80岁的蔡瑞云微弯着腰,透过老花镜,用一把老式剪刀仔细修剪着指缝间的头发,动作缓慢而专注。正在理发的孙大爷说,他在这儿理发已经十几年了,不仅因为便宜、离家近,更重要的是让他感觉“心里暖烘烘的”。

蔡瑞云是河南许昌禹州市朱阁镇人,年轻时和丈夫在许昌市运输公司辖下的国营理发店工作。1986年,蔡瑞云和丈夫双双退休,夫妻俩想到了理发。他们在许昌市解放路南段开了家“老中青理发店”,旋转理发椅、锃亮的刮胡刀、干净的擦胡棉等设备一应俱全,理发一次0.5元,吸引了众多顾客,2000年,理发涨到了两元钱。

10多年来,即使房租已经从180元涨到了300元,理发的收费标准却没有变过。虽然一直处于保本经营状态,有时顾客少,还会亏损,但蔡瑞云说:“我又不指望这个发财,就是图个大家方便。”2012年老伴儿去世后,理发店就成了蔡瑞云的寄托。虽然每个月的退休金足够日常花销,6个孩子都很孝顺,但她仍坚持每天早上不到7点就来到店里,打扫卫生后等待顾客上门。

如今,蔡瑞云年事已高,理发时必须戴着老花镜才能看清,但她还没有休息的打算。她说:“到我这儿理发的人大多是老年人,我放心不下他们。”

2016年11月份,蔡瑞云被评为“中国好人榜”诚实守信类中国好人。她说,“我干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小事还是能做到的。大家有需要我就干着,小车不倒只管推,啥时候干不动了再歇吧”。

上图 蔡瑞云(左)在给顾客理发。(资料图片)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杨开新 徐达  
联系邮箱 jirbw@163.com

王印祥:

## 播撒生命的希望火种

本报记者 于泳

人物小传:

王印祥,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科学家、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主持完成了国家一类新药“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用于肺癌治疗,并于2011年上市,是中国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国家专利金奖。2015年,他创建由贝达及数家VC联合投资的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专注于原研药的研究开发。



2016年11月7日,伴随着上市钟声,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创业板,贝达药业的核心产品名叫“凯美纳”(学名盐酸埃克替尼),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靶向抗癌新药,于2011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批准上市,结束了我国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曾称赞这一成果“堪比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

截至2016年上半年,服用凯美纳的患者人数超过了10万人。凯美纳的研发团队出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团队的核心就是王印祥博士。

### 学海摇橹

1980年王印祥高中毕业,本着只要能被学校录取、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原则,他填报了当时甚为冷门的卫生专业。入学后他才知道,卫生专业毕业生将来要到防疫站工作。毕业后王印祥被分配到河北邯郸地区卫生防疫站。防疫站的工作很接地气,下煤矿、进工厂是家常便饭,工作相对固定也相对单调。“那时候感觉预防医学工作像行政工作似的,和我当科学家的梦想相差甚远,于是萌生了考研深造的念头。”王印祥说。经过几年的准备,他如愿考上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专业是毒理学。那一年,他24岁。

已经成为毒理学研究生的王印祥,他的日常工作包括给实验动物喂各种药物,然后监测肝功能、体重变化,再作毒理分析等。这个时期,分子生物学刚刚在中国兴起,听到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同学整天谈论“基因”“克隆”等话题,对生命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王印祥被深深地吸引。他意识到,分子生物学专业才是他想要的科学,于是决心将研究方向转向分子生物学。1993年,王印祥考入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开始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他不曾想到,这一去美国,整整用了10年。

### 抗癌新药

上世纪90年代,肿瘤的药物治疗仍然以化疗药为主。这些药物的一大特点是除了能杀死癌细胞,也能杀死正常

细胞,毒副作用非常明显。怎样才能找到只杀伤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没有影响的药物,是当时学术界的研发热点。

经过多年研究,科学家发现慢性骨髓型白血病是罕见的BCR-ABL融合蛋白激酶引起的,这个染色体突变早在1960年就被发现了,叫作费城染色体突变。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的摩克隆出这个基因。1999年,王印祥到耶鲁大学做博士后,他的博士后导师就是巴尔的摩的学生。王印祥跟着导师的项目也投入到肿瘤和激酶的研究。激酶抑制剂,正是靶向抗肿瘤药物的起点。到2001年,诺华制药生产的格列卫获批上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靶向抗肿瘤药开始造福成千上万患者。

在一次留学生派对上,王印祥与马里兰州的医用化学博士张晓东相识。交谈中,两人都认为靶向药物开发大有可为,决定一起创业,开发新型的靶向抗癌药。王印祥负责生物部分开发,张晓东负责化学部分设计。在美期间,王印祥与多位投资人接触,希望拿到天使投资,但是收效甚微。后来王印祥与同学丁列明谈起这个项目,意外地引起了丁列明的强烈兴趣。丁列明也是学医出身,加上与王印祥多年的朋友关系,他决定投资这个新药项目的研发。2002年底,丁列明在杭州注册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支持王印祥团队的新药研发。两个月后,王印祥辞去美国的所有职务,回国创业。

### 创业之路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回国后,王印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租下30平方米的实验室,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化学药剂的合成往往需要多个反应才能实现,每一步都需要不同的设备。比如合成中间一步的反应需要氢加压环境,由于氢气加高压后危险性较大,当时整个北京市都找不到这个反应釜,王印祥只好带人到河北廊坊,在一个用水泥搭建的氢加压的釜中完成反应试验。王印祥认为,用安慰剂对照不足以显示凯美纳的疗效,他们最终决定用阿斯利康生产的同类药物易瑞沙与凯美纳做临床对比试验。在实验机构方面,他们还跑了27家医院自己做质量监控。如果一切顺利,2009年1月份,27家医院

元钱就买得到一套资料报审。王印祥去药审中心答辩时,完全按照学校的思路详细讲解,参与评审的专家非常惊讶:国内竟然还有这样的公司去做这样严谨科学的项目。2006年7月份,公司顺利拿到了临床实验批文。

I期临床实验要选择一家权威机构,王印祥想来想去最终选择做临床实验最严格的北京协和医院。当他打通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主任单渊东教授的电话时,对方的回答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们不接不靠谱的小企业课题,影响声誉。”医院一些科室甚至在医生办公室门口贴告示“医药代表谢绝入内”。王印祥没有放弃,他找到单渊东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单老师,请您给我20分钟时间介绍一下我们的课题。如果您听完了还是不能接受,我转身就走。”没想到,一聊就是一个半小时,单渊东听后决定把临床实验报告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核。事后,单渊东对临床药理中心主任胡蓓说:“贝达那个老总不像一个商人,像个科学家。”

### 新药攻坚

药品研发进入临床实验阶段。虽然王印祥与团队精心设计方案,但毕竟是第一次,临床实验并不顺利。第一例患者服药5天后,从卧床到能做家务,症状明显改善。可是,到了第四位患者,给药一星期后出现呼吸困难。临床实验陷入停滞,医院内部甚至有人提出不应该接受国内药企的实验,大范围的质疑声随之而起。无奈之下,王印祥找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孙燕和石远凯、张力等专家前来会诊。专家们在调取资料后认为,这是国内第一个靶向抗肿瘤药,是否可以1例1例患者入组,观察1个月后再入组。

到III期临床实验阶段,对照样本又成了争议的焦点。美国的罗氏制药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都是用安慰剂做对照,王印祥认为,用安慰剂对照不足以显示凯美纳的疗效,他们最终决定用阿斯利康生产的同类药物易瑞沙与凯美纳做临床对比试验。在实验机构方面,他们还跑了27家医院自己做质量监控。如果一切顺利,2009年1月份,27家医院